

足球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论游戏、劳动、市场与民族

Kai Froeb

关于本译本

本译本由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生成，尚未经过人工全面审校。如发现错误，请发送至 feedback@reflexivitypress.com 告知我们。已购买本书并向我们报告错误的读者，将免费获得修订版电子书。

作者
Kai Froeb
https://kai.froeb.net

出版社
Reflexivity Press
São Martinho do Porto
凯·弗罗布系列

最新版本及勘误说明: https://reflexivitypress.com/zh/books/froeb-fussball-essay
反馈: feedback+zh.fussball-essay.v2.8@reflexivitypress.com
封面: https://reflexivitypress.com/en/about/cover-art/

出版
2026-11-17
翻译: 2026-11-19
版本 2.8
Typeset with LaTeX (LuaHBTeX, Pandoc + Eisvogel)

成书说明

本书借助语言模型Claude (Anthropic)撰写。构思、内容与责任由作者承担。本译本借助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完成。关于本书的工作方式，见作者的一篇文章：https://reflexivitypress.com/zh/about/machines-that-write/

© Copyright 2026 by Reflexivity Press, São Martinho do Porto.
保留所有权利。

Zero Marginal Cost License 1.3 (ZMC 1.3)

读者简明版

凡没有边际成本者，不应有障碍。

你可以

- 免费阅读、下载和复制作品。
- 在注明作者、来源和许可证的情况下，非商业性地数字传播内容未改动的作品。
- 在不改变内容的前提下，从技术上变更文件格式，并为无障碍访问进行必要的调整。
- 为个人、非商业性使用打印或委托打印单份副本并赠送；直接成本可以报销，但不得加价谋利。
- 为个人、非公开、非商业性使用制作翻译。
- 在教育和研究中个人使用作品，并在非商业性使用中按照学术标准引用，但不得以引文汇编取代作品。

条件

使用必须保持非商业性。在公开传播时，应在合理可能的范围内注明作者、作品来源和许可证。不得施加额外的法律或技术限制，也不得虚假声称得到作者或出版方的支持。

所有其余权利保留

本许可证仅允许明确列举的使用方式。任何超出此范围的使用，除非已为法律所允许，须经权利人单独许可。

法定使用权限和获酬请求权不受影响。 第三方权利可能适用其他条件。

重要提示： 本简明版仅供参考，并非独立的许可合同。以完整版**ZMC 1.3**为准：

https://reflexivitypress.com/zh/zmc/



关于作者

Kai Froeb (*1963) 居住在葡萄牙大西洋沿岸的圣马丁霍·多·波尔图。

当您阅读这本书时，您已经知道了关于作者最重要的事情：他不要求您相信他。他所有的书都构建成这样：书中所说的内容可以通过您自己的思考来检验——这不是谦虚的套话，而是建筑方式。当您的发现与文本不一致时，要么是这本书的边界已经达到，要么是您思维的某个特性变得可见了。这两者都比单纯的赞同更有价值。

通往这里的道路沿着两条长期并行的轨迹延伸。一条始于吕讷堡的高中阶段和格尔德成人教育中心的暑期学校，在那里，三周时间只用来深入研读一篇文本；这条路经由数学、信息学、企业管理、文化学和法学，有意不追求学位，以便为自己保留一条跨越学科的道路。另一条始于1980年，在一台Commodore CBM 8032上，通过Weizenbaum的ELIZA的复刻版，并成为了一项职业：编程、应用支持、项目管理和培训——先在小软件公司，然后在大IT企业，最后十多年担任企业职工委员会和工会成员。

两条轨迹属于一起，这一点很晚才显现出来。四十年软件工作中成为习惯的东西——分解结构、使依赖关系可见、检验某物在用力拉时是否承载得住——正是哲学论证所需要的同一门手艺。

自1998年起，Froeb编辑**hegel.net**，这是互联网上可用十一种语言、可能是最全面的多语言黑格尔资源，并附带一个包含五百多份黑格尔及19世纪黑格尔主义者数字化原著的公共档案。

通过hegel.net，他与Johannes Heinrichs建立了联系，Froeb如今作为出版人出版Heinrichs的作品。

他的座右铭源自那个学生时代，此后被证明是可靠的：“真理是整体。”这句话要求的是一种无需压制任何东西的整合——因此比听起来更难兑现。

如果您在这本书中发现任何不准确或被忽略的地方，您的批评是您能给予它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Zur Herkunft dieses Textes

In meiner Grundschule in Belgien gab es jeden Morgen Gymnastik. Ich habe jede Stunde darauf gewartet, dass sie vorbei ist, und bei Sportübungen geht es mir bis heute so. Beim Mannschaftssport wurde ich als Letzter gewählt. Im Fußballverein, in den meine Mutter mich anmeldete, durfte ich Torwart oder Verteidiger spielen, weil das niemand wollte; nach ein paar Monaten waren der Verein und ich uns einig. Beim Judo habe ich jahrelang meinen weißen Gürtel verteidigt. Das Beste daran war das Malzbier mit meinem Vater danach. Sportübertragungen im Fernsehen bedeuteten, dass die Zeichentrickserie ausfiel.

Später habe ich mit Kollegen Fußball geschaut, und hier im Café in Portugal tue ich es wieder. Nicht wegen des Spiels — das langweilt mich noch immer. Die Leute freuen sich, und man kommt ins Reden.

Genau das ist der Gegenstand dieses Essays. Wie bildet sich dieser Zusammenhalt? Woher kommt die Tradition, das Gefühl von Gemeinschaft, das „Wir“ eines Menschen, der keinen Ball berührt hat? Dass Politiker und Firmenchefs das benutzen, ist die kleinere Frage. Die größere ist, warum es sich benutzen lässt.

目录

足球发生时，我们身上所发生的 1

一个进球 1
游戏与劳动 1
球迷 3
为何它能粘合 4
为什么偏偏是足球 6
反面 6
谁在赚钱 8
那个大的“我们” 10
悬而未决的事 12

足球发生时，我们身上所发生的

一个进球

一个进球发生了[1]，整个体育场沸腾起来。陌生人彼此拥抱。千家万户的客厅里，人们对着电视机怒吼，仿佛球员能听到他们。第二天早上，办公室里有人说：“我们赢了”——而他连球都没碰过一下，不认识任何球员，跟球场上发生的事毫无关系。

这个“我们”从何而来?

游戏与劳动

自古以来，人们就区分必要的劳动、休憩和自由的活动；现代语境中，这又常常演变为劳动与游戏的对立。游戏看似自由，因为其目的自在自身之内；劳动则是不自由的，因为它指向工资、面包、生计。那么，游戏便是一方自由的岛屿，坐落在一个充满强制力的世界中。

只不过，这种区分分开了无法分开的东西。一个足球运动员奔跑、传球、射门，每一步都追寻着一个目的：控住球、找到队友、射门得分。传球服务于进攻组织，进攻组织服务于进球，进球服务于胜利，胜利服务于积分榜。一整层级的目的，一个架在另一个之上。游戏本身也并非把目的纯粹地“自在自身之内”。

快乐依然存在——在奔跑中，在成功的盘带中，在准确的传球中。但它并不外在于这些目的，而是寓于其中。人是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而非放弃目的时，拥有这种快乐。即便只是为了放松而玩，也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放松自身。

游戏与劳动的区别，因此并不在于一个有目的而另一个没有。区别在于目的如何在生活中扎根。游戏的目的被框定：它们在一个划定好的空

1 本文的写作灵感源于 Christian Iber、Agemir Bavaresco 和 Lutiero Esswein 的文章《Copa do Mundo – futebol, mercado e identidade nacional》（A Terra é Redonda，2026 年 6 月 24 日）。文中统领性的三分结构——游戏与自由、市场、民族认同——以及若干母题皆取自该文：作为简单规则之全球语言的足球、球迷归属感向消费的转变、民族在全球化中的延续。本文的处理方式另辟蹊径：从球迷的“我们”出发，从目的层级而非无目的性出发，从球迷粘合的机制出发，并将注意力视为一种经济原料。

间内有效，其后果是有限的，整件事是可重复的。输掉一场比赛，下周六重头再来。劳动的目的则处于现实生存的压力之下——达不到目的，失去的就不是一场比赛，而是工资、职位、生计。正是这种无后果性，让游戏在保持为游戏时变得轻松。在职业球员身上，劳动的严酷性又回到了游戏中。

职业球员所追求的目的，与街头球场的孩子别无二致，从传球直到升级，同样的层级阶梯。在他身上增加的，不是一个不同的目的，而是一只悬在整个层级之上的外来之手。他是雇佣劳动者：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身背合同，服从教练，效力于一个处于经济压力下的俱乐部。在他踢球时，关于他做什么的决定权已不完全在他自己——别人安排训练时他就训练，别人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他就踢，别人卖掉他时他就换俱乐部。他的意志并没有消失；他即兴发挥，做出决定，每一秒都在解读比赛。但他活动在一个由外部设定的框架内，并意愿着他本应意愿的东西——在合同、俱乐部和教练的目的之下。这并非因为他的处境等同于农奴或奴隶——职业球员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且往往富有——而是因为，以一种更温和、自愿的形式，同一个结构要素再次出现：活动处于一个外来目的之下。

这一点所涉及的，远超足球本身。变得沉重的，不是踢球这件事，而是在外来的指令下踢球。同一种活动，当它是自己的时，令人幸福；一旦有一个外来的意志凌驾其上，便令人压抑。看到这一点的人，会以另一种耳朵去听“必须更多地劳动”的要求。

在足球中，有某种东西掩盖了这一严酷性，而这正使它作为一幅图景如此好用。竞争、十一人的团结、共同的目标，这些光芒盖过了球员在为他人——为俱乐部、为它的所有者、为它的资产负债表——提供成绩这一事实。因此，球队常常被当作劳动世界的楷模：人们想象员工是一支团队，团结一心跑向共同的目标，而底下的资本主义形式——谁在执行谁的目的，成果归谁所有——则从视野中消失了。正是这一点，使这幅图景具有了意识形态上的用途。

在顶尖球员身上，雇佣劳动同时向两个方向翻转。向上：一个世界级球星如此稀缺，以至于他能开出条件，令一个普通雇员做梦也不敢想。向下：他的职业生涯短暂，身体损耗，认可取决于成绩。一次状态低谷，一次伤病，年龄增长，昔日被欢呼的人便不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资本是身体，而身体的市场价值，比通常的职业跑道结束得还要快；没有团结基金来兜底。对顶尖收入者来说，金钱起到了缓冲作用：谁在成名的岁月里积攒下百万资财，日后便有了保障。艰难的是下面的大多数球员，绝大多数职业球员本就几乎无法靠足球谋生，最终一无所有地站在那里。顶尖足球不是劳动世界的例外，而是它的极端浓缩。

就连球员自身，也像商品和劳动力一样，在这一秩序中流转。来自较贫困地区的天才——非洲、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地区——很早就被发

掘、培养、出售，并被拉向足球资本的中心，流向欧洲，以及近来钱袋子最鼓的地方。这与其他任何资本的运动别无二致：它在哪里寻找廉价力量，就在哪里生长；并把产出拉向它已然积聚的地方。足球于此在缩影中映射了国际分工。

球迷

球迷并不踢球，他观看——并因一件他无法影响的事情而受苦、欢呼、盼望、绝望。支撑他的第一样东西，是对技艺的欣赏。谁观看一场好比赛，就看到了一些掌控某种技能的人，并懂得欣赏它；正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他才隐约知道那有多难。同样，人们欣赏一个歌手、一个演员、一个舞者的才能——那种在施行中显现出来的成就。对一次成功盘带的喝彩，并不是买来的。

但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球迷。对手的技艺可以欣赏，却可能照样讨厌他。球迷是偏心的，而核心正在于这一点。

他属于其中。“我是沙尔克人”，“我支持阿根廷”(DE: „ich halte zu Argentinien“)——这样的句子为一个人定了位。身为球迷，就是某个人：一个拥有自身历史、英雄和死敌的共同体的一部分。旧的归属正在瓦解——教派、阶层、终身的职业——而“我是谁？”这个问题敞开在那里。俱乐部提供了一个答案，它就在手边，无需教养，并把一个人置入一个更大的秩序之中。

这背后是一种比市场更古老的需求。那种孤立的、为自己计算的、以购买和自由选择为自由的人，原本并不存在。没有人是作为鲁滨逊来到世界的；人出生在一个家庭中，从一开始就在关联中思考。在市场尚未渗透一切的地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在那里，个体首先从亲属关系、地方、共同历史中理解自身，而非作为一个在选择个体的人。市场将这些关联一一拆解，拆成许许多多孤立的交换者——但并没有解散掉对共同体的需求。它加剧了这一需求。个体越是孤立，对归属的渴望就越强烈，而品牌、消费社区、粉丝圈、运动项目则以各自的方式满足着它。

这些共同体中，有些是现实的：同事、同学——虽然可以追问，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也已被竞争和金钱侵蚀了。另一些只是想象的，却并不因此而不真实：它们并不在共同符号之前就已存立，而是与符号一同生成，并且产生影响。一个被确证了的共同点在谈话中提供帮助，制造好感，给出一个连接点：说出同一个俱乐部名字的人，就不再是完全的陌生人了。在足球中，解体的征象摆在明处，但球迷仍然体验到与其他球迷联结在一起，并分享着一种在他看来是根本性的感受。

人们或许会认为，地方俱乐部至少是基于理性的——这可是“我的”球队。但球员们自身并不是我们。他们不是我们的孩子，甚至不是我们的朋友，而只是碰巧出生在同一座城市里的人——在职业俱乐部中，就连这一点也算不上，他们是高价从全世界买来的。人们不认识他们。

因此，联结的东西不在球队之中，而在环绕它周围的东西里。事物越是切近，现实的共同痕迹就越多。也许，某个熟人的侄子在踢球。更重要的是：同事们全都去，办公室里的人一起紧张，父亲和祖父已经支持过同一家俱乐部。而所有居住在当地的人，无论怎样都分享着某种东西——俱乐部使这一共同性变得可见，它象征着它。这底下有着一个现实的基础：一个地方的人确实在彼此交往，而在俱乐部中，他们再一次看到了这一点。

当整体变得更大时，这一点就变化了。对一个微型国家——摩纳哥，一个岛国——来说，其公民所共享的，几乎和一个城市的人一样多。对德国、巴西、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共同的基础就变稀了；国家队所象征的东西，底下几乎不再有一个现实的共同体。越是遥远，痕迹就越少——直到在遥远的明星身上，除了热情本身，什么现实的东西都不剩了。

因此，在今天，运动扮演着一个特有的角色。以前只有两个电视频道的时候，整个国家在同一时刻坐在同一个侦探剧前。一家子一起看，并且知道此刻有百万计的人正看着同一幅画面。共时性在客厅之外建立了共同体。这已经破裂了；每个人有自己的连续剧，自己的频道，自己的屏幕。运动是为数不多的、最后的地方之一，在那里，千百万人仍能同时经历同一件事情——一处最后的营火。

为何它能粘合

俱乐部为什么粘合得比理性的限度更激烈？对比其他人们所依附的东西，或有助益。

首先是品牌。人通过自己所购买的东西来显示自己是谁——汽车、标签、技术。对大多数品牌来说，这只是一个符号；几乎没人会把自己的人格建立在穿这个运动鞋品牌还是那个品牌上。少数几个品牌做到了更多：苹果用户，哈雷骑手将他们的品牌体验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捍卫它，彼此认出。这就是广告人的梦想——把顾客做成一个教众群体。在梦想实现的地方，品牌几乎已经成了一个俱乐部。

在球迷这里，这样的教众群体已然存在，并且它建立在一个品牌所缺少的东西之上。品牌通过拥有而粘合；人们共享所买的东西。俱乐部通过共享的命运而粘合：胜利与失败，升级与降级，德比，伤病，转会。

苹果用户不会在星期六输给三星，哈雷骑手不降级。品牌拥有顾客；俱乐部拥有患难同志。人们相聚，共同紧张，分享欢乐与失望——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大家庭，多于一个共享的符号。

而且，共同的紧张并不是一种温吞的感受。心跳加快，有东西处于赌注之上，结果悬而未定。类似看恐怖片或惊悚片时，人之所以享受紧张和恐惧，正因为他坐在观众席上，不会被真正击中。只不过，球迷与电影院里的人不同，他以为自己是身受其中的——并且他是与其他人一起。共同的揪心，共同的欢呼，在他看来就像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近乎生存攸关，而这比任何平静的一致意见都更牢固地联结人。

在运动中，还加上一个特有的东西：人们以为自己在贡献力量。第十二人，主场比赛，那种认为自己的助威能造成不同的信念。在体育场里，这有点道理：看台的声浪托起己方球员并让对手处于压力之下，主场优势并非纯粹的幻觉。但在屏幕前，绝大多数人坐着的地方，没有球员能听到怒吼——而球迷在那里却同样紧张，并同样体验着自己是球队命运的共同参与者。粘合正是在影响力最小的地方最为强劲。

然后是竞争。苹果和 Windows 并不进行这样的较量；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更优越，但没有裁判，没有结果，没有判决。运动则作出决断，按照固定的规则，有胜者和败者。这是激情的独特来源，具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角逐自身的乐趣，那种较量。它不仅在体育场里，也在说唱歌手的词语对决中、Youtuber 的“beef”中、政治的舌战中。争论将人卷入；人通过反对另一方而归属某一方。另一方面是联赛运营的特质。一次选举决定一次，然后便安静了。这里，每周都有新的战斗、胜利、失败，赛季刚结束，下一个赛季已经开始。人永远不会最终胜利，永远没有完结；人永远不会最终失败，永远不会放弃。一架总是产生新张力的机器——因此，它几乎比任何东西都更持久地粘合人。

最后是共同的历史，包括那些痛苦的。每个俱乐部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旧的站台还在时，你曾在那里；一起驱车去客场比赛；一起经历了因最后一分钟丢球而致的失败。共同承受的创伤，只是无后果的——人输掉的是比赛，不是生活。正是这种无后果性，把它变成了粘合剂：谁一起承受过一场惨痛的失败，就被联结在一起，就像共同挺过真实困苦的人一样，只不过没有付出那样的代价。生活自身常常没有一段你出现其中的故事；它是一堆偶然事件的混杂。俱乐部的历史提供的，正是缺失的东西——一个带有凯旋与悲剧的叙事，你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

为什么偏偏是足球

这一切并不仅仅适用于足球。每一项体育运动都有自己的球迷，每一项运动上也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只是以各自相应的方式出现。但有些运动项目需要单独解释，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抓住了一个国家——往往是一种历史解释：英格兰的板球，美国的棒球，都是经过几代人成长起来的。

足球不止于此。它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起源地——越过欧洲，经殖民主义的道路，又越过了南美洲和非洲。在亚洲广大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它虽说没有同样的文化优先地位；在那里排在最前面的是其他项目：板球、棒球、橄榄球。但即便在那里，它也在成长，而世界杯越来越把这些地区拉了进来。为什么它在某些世界地区扎根远比在其他地区更深，这本身有待专门研究。而在它已经站稳脚跟的地方，这一点会自我强化：有地位的东西，媒体就大加渲染，而因为球星们是百万富翁，财富的理念就与这种游戏的观念联结在一起。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它的可达性。不是每个人都会唱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打高尔夫——前者需要天赋，后者需要场地、球杆和金钱。足球需要一个空旷的场地和一个球，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每个人都自己踢过球，每个人都能跟着跑，每个人都能一起庆祝。对于自己身体熟悉的东西，人的评价不同于那些只有高手才能掌握的东西。

就连选择支持谁，在这里也有自己的变动余地。从出身来说，是自己城市的俱乐部，是自己国家的队伍。但人们也可以把球技本身奉为榜样，超越出身来支持——支持梅西，支持罗纳尔多，正如过去许多德国以外的人支持鲍里斯·贝克尔。媒体大加渲染大众想看的东西，而大众想看的又是媒体大加渲染的东西，这不是单纯的操纵，而是一种相互强化的生意。

反面

球迷以为，自己通过加油助威就是在出力。从竞技上说，他的作用远比他以为的要小，而坐在屏幕前的那个更是毫无作用；他的欢呼替代不了一脚传球、一次跑位或一次射门。

尽管如此，他确实在出力，只是方式与他所想的不同。球迷不是消费者的反面，而是最彻底的消费者：球票、烤香肠、围巾、球衣、杂志，有时还有股票。还不止于此：正因为他当球迷并充满热情，他才使自己保持着对比赛的兴趣。这种兴趣，乘以上百万倍，使比赛变得有价值，因为球迷的注意力就是这里出售的商品。于是，竞技上的结果和经济上

的结果甚至彼此分离：在球场里发挥作用的人是较少数；坐在屏幕前、在竞技上毫无作为的人，才是其注意力支撑着整部机器的人。

因此，他确实帮助了俱乐部——不是靠让那十一个人踢得更好，而是靠他自己的热情，由此产生了让一切得以存活的那种兴趣。这是儒家仪式的逻辑：仪式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强求某个目标，而是因为它的施行肯定着秩序。同样，球迷通过做球迷并显示这一点来强化俱乐部。他的施行就是贡献——是他没有看到的经济贡献，而不是他以为的竞技贡献。

也许他没有看到是件好事。如果每场比赛都知道自己的真实角色是付款者，热情就会更难保持。被感觉到的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的分离不是偶然；它使投入保持纯粹。

注意力的利用已经走得多远，从它如今反过来改造比赛本身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2026年世界杯上，每一场比赛的半场都被三分钟的补水暂停打断，即使在有空调的球场和温和的天气里也是如此。两个半场就这样变成了四节，正如美式体育那样。第一个理由是值得尊重的：比赛在北美的夏季举行，高温危及球员。但在同一个暂停里，转播商现在可以插入自己的广告——至少在节目安排和国家规定允许的地方，因为并不是每一家都利用这一点；这是一次从正在进行中的比赛完全切走，而足球此前从未有过这种做法。国际足联保证自己并没有从中赚钱；获利的是转播权持有人，仅对美国转播商，坊间就流传着大约2.5亿美元额外广告收入的估算。准确数字是否属实，不如结构重要：一次比赛中断变成了可以出售的播出时间。[2]足球长期以来很不寻常，因为它的四十五分钟不间断地进行——中间没有地方插播广告块。恰恰是这一块空白现在被填满了。

同一逻辑也适用于决赛的中场休息，在2026年世界杯上首次仿照超级碗，把它扩展成了有知名音乐人参与的表演。补水暂停和舞台表演这两者有着同样的来源：球迷中没有人提出过这种要求，而两者都是自上而下地、在没有辩论的情况下引入的。这才是真正的发现——不是因为有广告和表演，而是决策的方向。比赛形式不再根据比赛或观众的要求来确定，而是根据什么可以营销来确定。实体跟随生意，而不是相反；而在这里最大舞台上得以确立的东西，此后将会更容易地在较小赛事中确立。

2 参见 Reuters，2026年6月24日，关于第22分钟和第67分钟的强制补水暂停及其官方理由；The Guardian，2026年6月14日，关于广告规则，这些规则允许转播商在暂停期间播放广告，只要他们在恢复比赛前三十秒回到比赛画面。并非所有转播商都利用这一点（例如 ITV 和 Telemundo 没有）。

谁在赚钱

数字让人从流言中清醒过来。一项年度统计收录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二十家俱乐部，把它们的收入分成三个流：比赛日（门票、餐饮）、转播和商业收入（赞助、广告、球迷商品）。最近一次，约43%来自商业收入，38%来自转播，19%来自比赛日。[3]

因此，在球场售票处，球迷只付了较小的一部分。但两个大的收入流都依赖于他。转播权值什么？它们值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观看；转播商为播出付费，是因为围绕播出可以出售广告。赞助商出于同样的原因付钱：因为球迷在看。最终，超过80%的收入都归结为同一点——对球迷注意力的营销，而这种注意力正是球迷通过做球迷而产生的。

（这些数字来自世界上最大的俱乐部，即那些最彻底地变成了品牌的俱乐部。在县级联赛里，账目看起来不一样，烤香肠更多，赞助更少。这个机械性向下延伸到何种程度，须另行检验；在顶端它是清楚的。）

在这个顶端还坐着一个人，人们很少谈到他：主办方。一项赛事需要有人来举办、制定规则、允许参赛者进入、确定地点、出售权利。这个人——世界杯的国际足联、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坐在垄断之上。在“世界杯”旁边无法再放一个世界杯，正如在城市的水网旁边无法再放第二个水网。谁掌握垄断，谁就几乎可以任意规定转播、赞助和门票的价格。

在2026年世界杯上，这种“任意”采取了新的形式。门票价格不再固定，而是随需求波动，像在交易所一样：对一场比赛的兴趣上升，价格就实时跟着上涨。这跟飞机票和酒店房间那种动态定价相同，它使门票接近于一种投机对象——它的价格不再衡量比赛的成本，而是衡量市场当时愿意给出的价钱。主办方由此正好抽走热情当下所值的那个数额。球迷的注意力本来就是真正的商品，现在更是在其最强烈的涨落时刻被挤榨。

如果由一个人单独决定什么能使无价值的东西变成有价值的东西，腐败就近在咫尺——这同地方政客决定一块农田是否变成建筑用地并无不同。国际足联的历史充满腐败，从贿赂体系直到有争议的赛事主办权授予。使它保持稳定的机械性与联合国的机械性相似：成员协会比联合国会员国还多，而且每个协会都有一票。一个小岛协会的票与足球大国一样重。这听起来民主，却有一个可以预见的后果。众多小协会合计构成多数，而它们依赖于来自上层的扶持——用于场地、教练、后备力量的资金。这种扶持是真实的、必要的；其双重性质正在于此。分配扶持的人，无论是否愿意，都制造了依赖和感恩，而想留在上层的人就会培育这种关系。并非每项扶持都是贿赂；但在一个准入、承认和金钱都经由

3 Deloitte Football Money League 2026；数据为2024/25赛季收入最高的二十家俱乐部，合计约124亿欧元。

同一只手流动的体系里，恩庇政治——通过分配实行统治——就容易滋生。于是，正当的帮助变成了效忠的手段，而无须任何公开的收买。只要多数被维持住，这笔赚钱的生意就不受干扰。

这个机械性如何运作，从赛事的扩大中可以看出。参赛队伍先是被扩充到四十八支，而在开幕赛当天，国际足联主席又把下一次扩军到六十四支提上了议论。[4]这个建议是南美洲足联提出的，作为一次性方案，为了纪念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一百周年。从竞技上看几乎没有支持的理由；更自然的是一笔别的账。新增的名额将主要惠及全球南方的国家，惠及非洲、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协会，而在那里首先惠及它们的官员，参赛会给他们带来扶持和荣耀。谁能给他们这两样，谁就拥有他们的选票。扩大看起来像是更多的参与，同时也是扩大被维持多数的工具。它不花坐在上层的人一分钱——代价由赛事本身支付，赛事因此变得越来越臃肿，也由球迷支付，对他们来说赛事变得更贵、更远。

同样的权力还决定谁根本可以参赛。俄罗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被排除在一切赛事之外；美国，其军队在同一些年里多次把暴力带过外国边界，却主办世界杯。人们不必把两件事等量齐观，也能看出这里缺少尺度：并没有一条规则把侵略者赶下舞台，否则它所打击的就不只是那一个。俄罗斯能被排除，是因为它已经孤立；美国是东道主、大市场、媒体强权，是支撑这场赛事的秩序中心——把它排除，等于把赛事本身打碎。谁可以站在国家的舞台上，决定的不是法，而是权力。

最尖锐的案例围绕伊朗展开。自2026年2月底起，东道国与以色列一起对这个国家进行一场未宣战的战争。当赛事于6月11日开始时，这场战争仍在进行。6月14日，即伊朗队首场比赛前一天，宣布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6月底，美国再次从空中攻击伊朗，而在7月12日，即决赛前一周，又出现了一波新的攻击。[5]其后果直接打击了竞技方面。伊朗队中很大一部分球员效力的国内联赛因战争中断了数月；球队不得不把驻地美国迁到墨西哥，而且只得到围绕各场比赛日期的短期签证，以致每场比赛后都必须立即返回；个别工作人员根本不被允许入境。然而赛事照常进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个自诩为各国人民友好之节的赛

4 这一建议由乌拉圭足协主席伊格纳西奥·阿隆索于2025年3月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中提出；南美洲足联（CONMEBOL）主席亚历杭德罗·多明格斯于2025年4月10日在该联合会大会上代表该建议（Buenos Aires Times，2025年4月10日）。詹尼·因凡蒂诺于2026年6月11日对巴西转播商 CazeTV 谈到这一点（Malay Mail，2026年6月13日）；7月他宣布，国际足联各机构将审查该建议（Al Jazeera，2026年7月13日）。

5 自2026年2月28日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The Daily Signal，2026年2月28日）；停战协议由总统特朗普于2026年6月14日宣布（NPR，“The U.S. and Iran announce a deal to end the war”，2026年6月14日）；伊朗的首场比赛，2:2对新西兰，于2026年6月15日在英格尔伍德举行（Dawn，据法新社）。在特朗普宣布停火结束后，美国于6月底和2026年7月12日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Al Jazeera“US launches new wave of strikes against Iran, aimed at ‘degrading’ military”，2026年7月12日）；决赛于2026年7月19日举行。

事，竟容忍主办方在球滚动时轰炸参赛者之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安排舞台的不是法，而是拥有舞台的权力。

下面许多人的投入和上面少数人的垄断租金是彼此相关的。球迷的热情，这件事中最真实的东西，就是上层用来变成利润的原料。

那个大的“我们”

还剩下开头那个“我们”——那个办公室里的男人说出的“我们”，尽管他什么都没有做。在世界杯上，这个“我们”变得最大。

谁在这里说“我们”？在同一个屏幕前，穿着同一件球衣，在同一个进球时欢呼的，有工人和董事，有收银员和主任医师。在比赛持续期间，整年都真实存在的东西似乎被扬弃了：阶层、阶级、财产的差异。

足球与这种差异有三种关系。有些俱乐部承受着它：同一座城市的两家俱乐部对立时，它就有了社会负荷——高雅的对抗朴素的，市民的对抗另类的，而选择哪家俱乐部就说明你是谁、不是谁。另一些俱乐部则弥合它：工业城市的俱乐部背后站着整座城市，从工人到厂长。国家队似乎抹去了它；它横贯所有阶层而联合起来。

这种共同体在外面、在现实的经济中恰恰不存在。那里人们是分离的——上与下，资本与劳动，贫与富。在球场里，在外面分离的东西显得统一了，就像在军队里一样，军队中各阶层也融合在一种他们平时并不分享的战友之情中。这是阶级的一种象征性扬弃，在体验中是真实的，而在后果上等于零：终场哨响后，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处境中。

在世界杯上，除了“我们”还加上了国家。那支球队代表着国家；它不仅是一个人们体验到的共同体，而且是一个代表着整体——民族——的共同体。因此规则发生了变化。参赛的不是俱乐部，而是协会，而谁想为一个国家踢球，就必须拥有该国国籍。这里逻辑就公开地翻转过来：出身他处、在别处出生的球员被归化入籍，好让他能上场，而当他进球时支持者们便表示欢迎。民族性通常所附带的那种排斥并没有干脆消失；只要球员成功地体现民族的我们，它就被暂时中止。进球的人属于这里。失败的人会突然重新作为人们记起其出身的那个异类出现。

各队所代表的东西，它们也表达出来。每支队都有自己的颜色、徽章、吉祥物，往往还有自己踢球和表现的方式，人们凭这些来认出它。球迷们继续演绎它们，用旗帜和涂画的脸来装饰自己，把各国特色推到民俗化——维京人的牛角盔、墨西哥草帽、国旗色的啤酒。这样，想象出来的统一在一个夏天变得多彩可见，而各国的多样性并排登上同一个舞台。这个场合也让电视观众顺便了解一些远方的国家，这些国家平时从不出现——一种比赛之间的地理课。

不过，支持自己的国家并非唯一的关系。此外还有对踢得特别漂亮的球队的欣赏——这是一种不依赖出身的享受。有人把这一点当作自己的一种特长：他们不只是挥舞旗帜，他们还能分辨和赞美美的东西。两者并行，而在拿不准的时候，最终仍是自己的国家获胜。这里账目奇怪地总是平的：自己的球队战胜了热门，那是一个伟大成就；平局，是一个光荣的结果；输了，那本来就是对阵最强的队伍。自己的国家实际上不可能输。

有一种同情是给小国的——不是给那个干脆被淘汰出局的小国，那只是滑稽，而是给那个在自己失败之前把一个大国踢出赛事的国家。这触到了真实：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更像大卫而不是歌利亚。正如一个人在自己渺小时把自己梦想进大国，他也把自己梦想进那个让大国难堪的小国。

如果再进一步，人们会把自己对各国的联想加在比赛对阵上——它们的政治、历史、在世界中的地位。那么决赛中就不是西班牙对阿根廷，而是老殖民强国对正在上升、自信的第三世界；而谁已经知道胜者，谁就知道世界将走向何方。但同一场比赛也可以作另一种安排：极端新自由主义、亲近特朗普的国家，对另一个有着不同传统的国家。两种解读都出自同一场对阵，而结果总是确证人们事先带来的那一种。能得出两个相反结论的东西，撑不起其中任何一个。每个国家都有足够的历史，使人们可以赋予它自己恰好需要的那种角色；范畴的选择取决于所期望的结果。2010年世界杯时，人们去问水族馆里的一只章鱼，让它通过在两盒食物之间作选择来预测比赛。它的选择与结果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政治化的附会在构造上是同一种动作——一种从外部附加到事物上的联系，而事物本身没有任何能承载它的东西——只是这种动作自以为深刻。十一个人对十一个人；谁赢取决于当天状态、偶然和裁判判罚，而不取决于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得到满足的是一种对意义的需要，而比赛本身并不提供这种意义。

但国家不是俱乐部。与俱乐部相联系的，除了选择之外一无所有；而人的生活真正依赖于自己的国家——通过法律、税收、保护以及人在其中所过的生活。因此民族认同不像对俱乐部的认同那样没有后果。在各国人民友谊和输得起的外衣之下，仍然运行着一种民族间的竞争，而它触及实在之物。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它在阶级和解中已经看到一种意识形态，一种鸦片——在这里遇到了它更尖锐的实例。比赛的“我们”也把统治国家的人及其政策包括进来——尤其是在人们对这种政策不满或者它违背自己利益的时候。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对祖国的批评很容易被视为家丑外扬；统治者乐于坐在看台上，置身于比赛的光彩之中，这光彩多少会染到他们身上。

但这光彩不只染到统治者。它也到达普通公民。来自其球队正在闪光的国家的人，在国外会被人搭话——好像他自己也做出了什么成绩。自

己的祖国有一支出色的球队，于是自己跟着它也有了一点出色。由此并不会产生太多东西，但确实会产生一点好感，而这种好感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是管用的。

这意味着什么，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也许象征性的和解消解了去处理现实分裂的压力——足球给人数小时的平等感，并取走了对现实平等的渴望的锋芒。面包与马戏。或者，这种被体验到的统一虽然毫无后果，却是可能之物的预兆——它提醒人们，各阶层能够相遇，分离者并不拥有最后的话。那样的话，足球就不是安抚，而是唤醒。哪种看法正确，取决于必须具体加以考察的种种情况。

悬而未决的事

有些东西只是顺带碰了碰。那种对相互对立的乐趣，那种根深蒂固的对“我们对抗他们”的需求，其根源依然敞开。足球流氓的暴力，不能从作为球迷中解释，而要从其翻转中解释：在人们于其他一切事情都感觉不到自己有效力的地方，象征性的对立便翻转成了现实的对立，而出口变成了起火点。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大型俱乐部身上展示的这一整幅图景，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街角的小球会，在那里，共同点的真实痕迹残存得更多。

足球同时是游戏与劳动、共同体与生意、真实的感受与出售的注意力、象征性和解，也许还是一次现实和解的先行映照。在进球时从千万喉咙里吼出的那个词——“我们”——之中，涵容了这一切。谁喊出它，事后可以把这一切拆开——而下一个进球到来时，他又会照样喊起。